

# 知 识 的 误 区

程 刚

## 目 录

|                             |     |
|-----------------------------|-----|
| 1 • 导言：知识的概观·····           | 3   |
| 1 • 1 • 古典主义知识观 ·····       | 7   |
| 1 • 2 • 科学主义知识观·····        | 18  |
| 1 • 3 • 实用主义知识观·····        | 33  |
| 1 • 4 • 心理主义知识观·····        | 39  |
| 1 • 5 • 知识经济知识观·····        | 49  |
| 2 • 知识进步的代价：两种文化的分裂 ·····   | 55  |
| 2 • 1 • C • P • 斯诺的演讲 ····· | 57  |
| 2 • 2 • 问题的源流及其考辩·····      | 65  |
| 2 • 3 • 深层原因的分析·····        | 89  |
| 3 • 对知识的偏见与恐惧：反科学思潮 ·····   | 134 |
| 3 • 1 • 宗教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 136 |
| 3 • 2 • 世俗文化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 148 |
| 3 • 3 • 社会政治领域的反科学思潮·····   | 163 |
| 4 • 知识前沿面临的困境：科学终结论 ·····   | 273 |
| 4 • 1 • 霍根其人其书·····         | 276 |
| 4 • 2 • 科学终结论的原委·····       | 279 |

|                      |     |
|----------------------|-----|
| 4 • 3 • 科学终结论之误..... | 308 |
| 后记.....              | 337 |

## 1 • 导言：知识的概观

知识是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因而也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有关知识的问题早已成为人类思维领域历久不衰的永恒主题。

对“知识的寻求象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 页）人类文明史就是由知识铺垫编织而成。正是由于知识的创生、积累和使用才使人类超越了动物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进化机制，在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等不朽之业的过程中，摆脱了个体有机生命的局限，既使个体生命具有了超越天年的价值，也为后继者提供了新的发展起点。

人类的循环加速发展机制有赖于人类文化的支撑，只有在前人奠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人类才拥有了其他物种难以企及的优越性。不但像牛顿（Isaac Newton）那样的划时代的伟大科学家肯于谦逊地承认自己是由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显得高大深邃，而且所有的普通人都都因为社会所特有的世代相继机制才得以在既存的社会文化起点上以人的方式生存和发展。社会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及营造社会生活的活动产物，包括物质性的产物和精神观念性的产物两个方面。就其对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后者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和将来的时代更是如此。确如波普尔（Karl Popper）的著名思想实验所深刻喻示的那

样，假如物质形态的技术系统毁灭了，而精神形态的知识系统（如图书馆）和人的学习能力还保留着，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艰苦历程，就仍然可以重建人类文明，继续在较高的水平上前进。如果认为波普尔的这一看法确有道理，那么我们对诸如知识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之类的至理名言的深刻涵义就会有更为透彻的理解。

事实上，在追求社会进步、对社会和人生持积极态度的文化传统中，有关知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早有共识，对此毋须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享用知识的恩惠并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丰富或充实人类知识宝库的时，是否思考过知识本身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对人类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并且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是否意识到在探索客观规律、追求知识或真理的过程中曾经多次陷入迷茫，甚至跌入误区？是否真正理解认识史和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曲折和失误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否怀疑过某流行于理论界和世俗社会的时髦观点的合理性？是否思索并追问过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反对科学、弃置知识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深层原因？等等。这是理智世界和知识阶层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

人类远非尽善尽美，人类创造生产的知识也不可能万古长青无一缺失；人类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他容易犯错误，并且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曾屡遭谬误和偏见的袭扰，不但曾经因为无

知而踟躇不前，也曾多次为理智的迷失和由此产生的习惯、定势等心理惰性及认识上的偏见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为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理智世界对知识的反思和批判贯穿人类的整个文明史，特别是在比较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种反思和批判更是历久不衰、绵延不绝。当前世界已逐步进入“能力本位”“智力中轴”的时代，知识的社会功能不断扩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攀升，“知识经济”成为流行话语，有关知识的实用功利主义理解和某些理想主义的文化梦想随之得到张扬。值此知识文化热潮又兴之际，重新检讨知识问题，冷静地思考一度流行的与知识有关的思想主张和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历史闹剧，就显得尤为必要。

知识的本性问题是一个超越具体学科的疑难问题。古往今来，以知识为主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层出不穷，但迟至今日仍是歧见纷呈、莫衷一是。究其原委，可否这样认为：一方面，由于对知识本质的探讨长期受哲学认识论的影响，研究框架在很长的时期内一直没有突破；另一方面，相关的具体学科和理论派别都从自己的角度为知识立论，看法也就难以达成一致。为了对知识本身有更为深入系统的了解，也为了使随后的讨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基础，让我们首先对有关知识的基本观点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发展作一简要的回顾。历史上关于知识本性的议论，门派众多，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比较系统的观点主要有古典主义知识观、科学主义知识观、实用主义知识观、心理

**主义知识观和知识经济的知识观五种见解。**

## 1·1·古典主义知识观

古典主义知识观来自于传统哲学。哲学则起源于人类开始以物质原因来解释世界之时。自开天辟地、人类理智萌发之初，理智世界就对自然奥秘感到惊奇并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追问，不但追问自然之谜本身，而且追问对自然的探索过程及其产物，于是就产生了知识究竟是什么这一事关知识本性、看似寻常而又十分费解的问题。这个同哲学一样古老的问题，千百年来既令人沉醉痴迷又百思不得其解，甚至让许多智力精英耗尽了毕生精力，而对知识本性的追索又引发了一系列的难以解答的哲学问题。

“古希腊人以‘哲学’这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指称各种理论知识”。（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1 页）我们现在使用的“哲学”这个术语，其希腊文原意就是智慧和知识，哲学的本义就是智慧之学，哲学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教导人们求得关于世界本源的知识。从古希腊时代开始，有关知识的哲学断语和箴言就不绝于史册。古希腊开创了人类弘扬理性和追求知识的文化传统。在古希腊，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主要是以理性沉思的方式围绕着“一”与“多”、“一般”与“个别”、“稳定”与“变易”、“感觉”与“思维”等相互矛盾的范畴及其辩证关系展开的。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指出：“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

馆 1961 年版，第 23 页）“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同上书，第 22 页）在他看来，感觉经验固然可以使人博学，但是不足以使人智慧，“最优秀的人宁愿是一件东西，而不要其它的一切，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同上书第 25 页）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只要对世界万物的本原及其规定性作出说明，就算达到了最高的智慧，不过他们不是从感性存在物中寻找本原，而是用抽象的“数”来说明万物的变化，提出了“万物皆数”的命题。在他们看来，数即知识，知识也就是数字。尽管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却足以表明，希腊人的理论思维又有了新的发展。大约与赫拉克利特同一时代的爱利亚学派在哲学的基本精神方面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强调真正的存在是“一”而不是多，“一”是精神实体，只有认识了“一”，才能得到真理。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巴门尼德（Parmenides）认为，真正的存在是一种只能在思想中加以把握的精神的存在，把握这种存在的认识才是“真理”，其他认识则都是“意见”。巴门尼德可能已经看到了认识活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感官的直接对象永远是“多”，但是在思想中的反映却逐步变成了“一”。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对“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一”来自于“多”，主张不要到“多”以外去寻找“一”，并提出“射流说”来说明对象向感觉和思想的转换过程。德谟克利特



(Democritos) 从他的原子论出发，在“射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像论”，认为不仅作为万物始基的原子和虚空是真实的，而且作为杂多的现象也是真实的，所以他不完全同意前人关于感觉只能提供意见，理性才能获得真理的说法。在他看来，现象就是真理，意见和真理并非完全对立，感觉和理性各有所司，它们对于知识来说都不可缺少，但二者并不是必然可靠的。

智者学派把德谟克利特提出的知识的矛盾性加以充分发展，对认识客体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其代表人物普罗泰哥拉 (Protagoras)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口号，认为外物究竟如何，完全依个人的感觉而定，只有可感觉的东西才是存在的，超出感觉之外的事物都是无法证明的，也是根本认识不了的。这样，感觉不仅是认识的唯一途径，而且又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这些看法存在多么明显的局限性，但却表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主观因素的作用。继普罗泰戈拉之后，智者学派的另一重要思想代表人物高尔吉亚 (Gorgia) 进一步证明，要想寻求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只能是枉费心机，认识的结果和认识的对象在形式上是很不一致的，思想之所以为思想，不在于它的直接性，而在于它的间接性，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个别，而认识的结果则必须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一般，否则就不成其为认识。

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打破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能力的盲目乐观情绪，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另辟求知之路。苏格拉底（Sokrates）就是有感于世界本原、宇宙演变等问题非人力所能及而转向探索人类社会事务，认为学人应该研究自己的社会，以辩明善恶是非、求得社会道德面貌的改善为基本职责。苏格拉底继承了爱利亚学派的传统，贬斥感觉，抬高心灵，视抽象理智为唯一有效的致知途径，强调唯有一般知识才是真知识，只有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才有意义，甚至把全部知识的内容归结为一个命题：美德就是知识。他还第一次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区别问题，指出认识的方向应该是摒弃个别和特殊，而去追求一般和普遍。这表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在万物之外去寻求一种单独的本原，而要求深入到万物之中去探索它们的本质了。柏拉图（Plato）继承了其师苏格拉底的哲学事业，但他把一般与个别加以割裂，构筑了一个“相”（Idea，旧译为“理念”，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六656-658页）的天国，使之与具体的感性现象世界相对立，在此基础上对知识和“意见”作了严格的区别。他认为，“意见”来自于可见的现象世界，知识来自于可知的“相”的世界；感觉只能提供暂时的、表面的“意见”，只有通过思想才能认识一般、即“相”，从而获得知识；“意见”只是由无知到知识的一种过渡性心理状态，“意见既非无知，亦非知识”，它“比知识阴暗，比无知明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23页）“意见”分为关于实际事物的“意见”和对实际实物的摹仿的“意

见”，知识则包括算术、几何、天文等有关自然的知识和真理（或绝对知识）两个层次。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对一般、共相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着重分析了人类如何获得关于一般、共相的知识问题，实质上是强调和提高了抽象思维的地位，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知识问题开辟了道路。

柏拉图的学生、被马克思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s），有鉴于柏拉图抬高一般并割裂一般与个别的片面性，在知识的问题上致力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他认为，柏拉图的主要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否定了一般、共相固然不可能有认识，但一般、共相不是直接的认识对象，因为一般、共相自身不可能独立存在；一般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真实存在的事物必然是个别或特殊，不可能是一般，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神秘的“相”，具体事物都是一般与个别、共相与特殊的统一体；感觉是认识的第一个行程，但感觉是肤浅的，它的内容是由客体决定的，仅涉及到个别事物的知识，关于普遍、一般的理论知识比感觉经验更重要；知识本身不是“或然性”的意见，而是真理，真理是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而证明首先应当是理论与客体的相符合。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古典知识观的基础。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Raphael）的名画《雅典学院》（亦译《雅典学派》）十分传神地描绘了柏拉图用手指着天空、亚里斯多德用手指着大地的情

景，这些形象抓住了两位伟大哲学家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的本质区别，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经久不忘。这种区别事实上贯穿于此后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交相辉映的两大主流。两派在历史的延展过程中围绕着“一般”能不能单独存在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一争论到了中世纪便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或实在论）这两种观点和学派的对立。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客观上存在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而在于表现为一般的思维的确实性何在？因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便形成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研究的侧重点也由客体本身转移到主体的认知方式及其可靠性方面。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对人的认识方式曾作过极为精彩的比喻，他说：“经验主义好象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象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40—41 页）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则对哲学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并加以必要的限制，明确地把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认为哲学的本质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其中心任务是要回答“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的知识的依据是什么？”的问题。笛卡儿的认识论是从“怀疑一切开始，通过对思维活动的理论分析，确定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原理，以及“上帝存在”、“各种事物及事物的性质存在”等最基本的“天赋观念”。他坚信，“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的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笛卡尔：《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1 页）感觉是易谬的，常常被现象所迷惑，只有理性思维才能达到科学的要求，理智决不会欺骗我们，“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同上书，第 3 页）

笛卡尔之后，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问题上各执一端，走向了片面：前者重视思维的内容而忽视了思维的形式，后者只着眼于思维的形式而没有对思维的内容给予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认识的确实性和可靠性是建立在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就认识的直接对象而言，它永远只可能是经验所提供的个别；就认识的结果而言，它却又永远表现为思维所提供的一般。经验论者坚持认识开始于经验，认为凡是在理性中的必首先在感觉中，但却不懂得理性认识的本质，不懂得科学抽象，把理性简单地理解为感觉经验的机械组合或分解，最终导致了否定人们把握普遍必然性知识的能力，走向了不可知论。唯理论者抬高理性认识，贬低甚至否定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认为感性认识只能提供个别偶然的知识，唯有理性认识才能提供具有普遍

性、必然性的可靠知识，把知识与感性世界相隔绝，使知识本身成了无根之草、无源之水，导至了独断论。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两派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甚至对立的观点，但起点都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当我们宣称自己拥有某种知识时，如何才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殊途同归，都以颂扬人类的知识和理性、探索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为始端，以取消人类认识的发展而结束，把疑难留给了后人。康德（Immanuel Kant）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试图批判地总结两派的经验教训，调和二者的矛盾，以便从他们的迷误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知识的逻辑形式就是判断，但并不是一切判断都能提供新的知识，也不是所有的判断都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例如，根据唯理论的原则建立的知识，总是表现为先天分析判断，这种判断在抽象思维领域虽然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并不能增加什么新知识，不能扩大知识的范围；根据经验论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知识，总是表现为后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虽然对事实有所断定，但却不能保证判断本身是必然的和普遍有效的。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不断地提供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为弥补上述两种判断的缺陷和不足，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在他看来，没有这种判断，知识便是不可能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形而上学”中的许多命题实际上都是先天综合判断。例如，

“ $7+5=12$ ”，“在物质世界的所有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就是既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又具有扩展性，能够增加新知识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他试图借助先天综合判断来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割裂感性和理性这一共有的缺陷，既肯定经验论的原则，承认认识始于经验，又遵循唯理论的主张，同意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不是来自于客观经验而是由主观上的“自我”提供的观点。这就是说，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经验，另一个是理性先天固有的认识能力；知识的内容是客观的，知识的形式则是主观的。如他所言：“吾人一切知识始自感官进达知性而终于理性”。（《纯粹理性批判》，第 245 页）

在康德时代，近代自然科学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此后，那种认为哲学是科学女王、是一切知识的精髓和各种知识的包罗万象的构架的想当然的主张早在 17 世纪就已经基本上临近终结、不在时兴了。“黑格尔是敢于在其思想中坚持那个骄傲主张的最后一人，他明确强调哲学是一切万能知识的构架和包罗万象的总体。”（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版，第 20 页）黑格尔（Georg · W · F · Hegel）力图构建一个容自然与历史、自然与社会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宏大哲学思想体系。由于这一综合将古希腊时代所开创的关于理性思辩的古老传统发展到了极致或顶点，这与学科分化加速、实证研

究凸现的时代精神显然不十分协调，因此，它必然也不能逾越辩证法的普遍原理，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声望。黑格尔充分肯定了人的思维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相互转化的思想，认为人的思想不仅能够把握存在，而且要在存在中不断地实现自己，使存在同思维相符合；同时，黑格尔还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无论是一个人的认识，还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都不可能有无条件的真理性。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独立于主体和人脑之外的“客观思想”、“绝对理念”和“宇宙精神”，尽管他的哲学中的确含有批判神学的成分，最终他还是滑向了神学，又用神学否定了哲学，因而又得出“上帝是最完善的‘存在’”这一含混过时的结论。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就此曾坚锐地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5页）费尔巴哈用“人”否定和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基督教的“上帝”，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同上书，第181页），不可能有一个脱离人脑而存在的思维实体。这样，费尔巴哈就把哲学由天上又拉回了人间，他承认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人类的认识能力则是无限的，深信“我们没有认识的东西，将为我们的后人所认识”。（同上书，第635页）

西方哲学的古典传统到费尔巴哈已走向终结。古典



知识观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知识的合理性和知识的表现形式四大问题。古典知识观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为现代知识论确立了基本框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并开启了追问知识的新的逻辑起点，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有关知识问题的悖论和疑难。